



学术研究指南丛书

魏晋南北朝 哲学思想研究概论

天津教育出版社



学术研究指南丛书

魏晋南北朝 哲学思想研究概论

许抗生 著

天津教育出版社



(津)新登字006号

责任编辑: 许幼珊

书名题字: 韩嘉羊

封面设计: 董建

魏晋南北朝哲学思想研究概论

许抗生 著

*

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湖北路27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天津市武清县永兴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 8.25印张 5插页 184千字

1991年11月第1版

1991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精)

ISBN 7-5309-0881-2

B·18 定价: 5.40元

出版说明

我们奉献给读者的这套大型系列化丛书——《学术研究指南》丛书，是以介绍哲学和社会科学各分支的概况、研究成果、研究动态和发展趋势为主要任务的。它是大学生、研究生跨入学术殿堂的基础读物，也是学术界、文化界、新闻出版界的必备参考书。

解放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学术界空前活跃，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向科学的深度和广度进军，结出了累累硕果。数以千计的学术专著和数以万计的学术论文的出版，就是最好的证明。一大批青年人为这种日益浓厚的学术研究空气所感染，希望跨入学术殿堂，为科学研究献身。但是，当他们接触到浩如烟海的资料、专著、论文时，便无所措手足了。有时，他们遍翻群书，也难得门径。一些学术界、文化界、新闻出版界的同志，常常接触自己并未作过深入研究的科学领域，但需要对其成果作出某种判断，也往往翻了好些书而难得要领。

为了解决类似的难题，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概览性的、既有成果总结又有指示学术研究门径的书。这套丛书将分门别类介绍哲学和社会科学各分支的研究沿革；对各学科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纳和分析；对各学派或不同学术观点进行评介；对当前

的研究动态及对未来研究趋势进行预测；还要介绍各学科特有的研究方法和手段。为了便于研究者检索，书后还附上该学科的基本资料书目及其提要 and 重要论文索引。这样，本书便集学术性、资料性和工具性于一身，一册在手，即可对某一学科研究的基本情况一览无遗，足供学人参考、咨询、备览；对需要深入研究的内容，也可按图索骥，省却“踏破铁鞋无觅处”的烦恼。

《学术研究指南》丛书，就每一种看，是该门学科研究的系统的具体的总结；从整体看，则是一定历史阶段学术研究成果的总检阅。因此，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将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它将为保存和积累文化，繁荣学术，培养新一代学术接班人起推动作用；从出版角度看，它填补了学术著作领域特别是“入门”这个层次的空白，也算作我们对出版事业的一点贡献。

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得到许多专家学者的热情支持和帮助，我们在此深表感谢。我们期待有更多的帮助，以使这套丛书日臻完善。

天津教育出版社编辑部

前 言

《魏晋南北朝思想研究指南》是一部为初学者提供研究入门之书，主要面向大学生、研究生和广大青年、业余爱好者，对专业工作者亦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全书包括魏晋南北朝学术思想流派发展概况、魏晋南北朝思想研究历史沿革简述、魏晋南北朝思想研究成果概述、当前研究的动态和对未来研究趋势的分析、魏晋南北朝思想史基本书目简介、魏晋南北朝思想史重要学术论文提要、魏晋南北朝思想史研究参考书目简介和魏晋南北朝思想史论文索引，共八个部分。该书可说是对前人研究成果的一次总结，同时又具有资料性、工具性的特点，为初学者提供研究的方便。由于时间和精力所限，所搜集的资料文献很可能是不全面的，论文索引部分和港台资料很可能遗漏较多，望读者见谅。在撰写过程中，得到了王军同志、张风雷同志不少帮助，特此表示感谢。

作者于北京大学哲学系

1988.12.

目 录

一、魏晋南北朝学术思想流派发展概况·····	1
(一) 名法之学·····	3
(二) 玄学·····	8
(三) 佛教·····	17
(四) 道教·····	24
(五) 儒学·····	28
二、魏晋南北朝思想研究历史沿革简述·····	30
三、魏晋南北朝思想研究概述·····	41
(一) 魏晋玄学研究概况·····	41
(二) 魏晋南北朝佛教研究概况·····	76
(三) 魏晋南北朝道教研究概况·····	89
(四) 魏晋南北朝经学研究概况·····	96
四、当前研究动态和对未来研究趋势的分析·····	99
五、魏晋南北朝思想史基本书目简介·····	107
(一) 魏晋玄学的基本书目·····	107
(二) 魏晋南北朝佛道两教的基本书目·····	113
(三) 魏晋南北朝其它思想家主要书目·····	119
六、魏晋南北朝思想史重要学术研究论文提要·····	125

（一）一般概论提要	125
（二）主要玄学人物研究论文提要	160
（三）佛道两教研究论文提要	196
（四）其它思想家的研究论文提要	211
七、魏晋南北朝思想史研究参考书目简介	217
八、魏晋南北朝思想史论文索引	223

一、魏晋南北朝学术思想流派发展概况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学术思想比较活跃，它打破了汉代经学一统天下的局面（严格地说，汉代学术也并不是单一性的儒学，除儒学之外，尚有黄老之学，以及与其有关的道教与佛教的兴起），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汉代经学的僵化与形式化倾向，人们可以自由地思维，以致使得沉睡了好几百年的先秦的许多学派与思想，在这一时期里，又相继活跃了起来。继春秋战国之后，学术界呈现出又一次“百家争鸣”的局面（当然其规模远不如战国时代）。

自汉末官方儒学衰微之后，从三国（公元220—265年）、两晋（公元265—420年）至南北朝（公元420—589年）时期，在学术界经历了几次大的变动，首先复兴的先秦学说是汉末魏初的名法之学。然后是魏正始年间产生，并在魏晋时期成为重要学术潮流的老庄之学，一般人们把它称之为玄学（亦有的学者称之为新道家）。从西晋末至东晋时代，在玄学思潮影响下，在战乱、分裂、动荡的时代背景下，佛玄结合的佛教玄学与玄道（道教）结合的道教神仙学得到了勃兴。在这一时期里，儒学虽说“中衰”，其势力远不如汉代，但儒学并没有止息，也还得到了新的发展。孔子仍然保持着圣人统治的地位，儒学也常为最高统治者所提倡，尤其是经学在历史上还占有相当的成

就与地位。进入南北朝时期，玄学衰微，儒、佛、道三教形成鼎立的局面，它们之间互相纷争又互相吸取与融合。一般来说，三者之间以儒佛斗争与佛道斗争为最激烈。儒家与道教是我国固有的文化传统，佛教则是从印度传来的外来文化，儒、道与佛教之间的斗争，就其性质上说，是中外文化在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冲撞，儒家与道教都以维护我国的封建君主专制主义与封建等级制度的“三纲五常”为己任，而印度的佛教宣扬出家修行的出世主义思想，这就直接与我国的忠孝观念的封建伦理相矛盾，以此印度佛教遭到了儒家与道教（道教虽说也宣扬出世思想，但它把封建伦理的忠孝思想当作自己宗教教条的内容）的猛烈抨击，在这方面，佛教为了求得自己的生存，只得屈服于我国传统的文化，逐步地把我国封建的“三纲五常”思想吸收到佛教教义中去，以调和两大文化之间的矛盾。至于在南北朝时期焕发的儒家神灭论（以何承天、范缜为代表）与佛教神不灭论之间的斗争，虽说范缜他们在理论上战胜了佛教的神不灭论与因果报应学说，但佛教并没有就此止息，宣布放弃自己的学说，而是后来佛教（隋唐佛教）用更精致的唯心论，并吸取了中国固有的文化思想，来宣扬佛教的基本教义，使得佛教进入了全盛时期，最后迫使得后起的儒学家（宋明理学）也要来吸取丰富的佛教唯心论哲学思想，以充实、补充、发展自己的儒学思想体系，从而使得儒家重新赢得了统治的地位，而排斥了佛教的势力。这就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中外文化冲撞的辩证法及其矛盾发展的过程。

以上就是三国、两晋、南北朝共三百六七十年的学术思想演变的概貌。下面我们再把其时的主要学术流派作些介绍：

（一）名法之学

名家、法家之学复兴于汉末魏初时期。曹操为了实现其统一中国的抱负，采取了打击和抑制地主豪强的政策，曾经一度在政治上推行刑名法治：“魏武初霸，术兼名法”（《文心雕龙·论说篇》）。正由于曹操等人推行名法之学，所以当时先秦诸子学说中首先得到重视的是法家与名家。正如《三国志》中所说：“今之学者师商、韩而上法术”（《三国志·魏书·杜畿传附子恕传》），《晋书》则称“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这些说法是符合当时实际的。下面我们再分别介绍一下当时的法家和名家的思想。

法家 当时崇尚法家的主要人物首推曹操。曹操在政治上“揽申商之法术”，主张“重豪强兼并之法”。早在他二十岁任洛阳北部尉时，就主张实行法治，史书记载当时的情况说：“（曹操）造五色棒，悬门左右各十余枚，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在军队中，则主张“以法治军”，要求做到“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毫不与”（同上）。在经济上实行先秦法家的耕战政策，认为“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同上）。他效法“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的办法，实行屯田制度。在选拔官吏上，曹操明确提出“唯才是举”的主张，他认为：“明君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同上）而“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以此他主张选拔那些“或堪将守，负污辱之名，众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之

士，做到“明扬仄陋”。曹操的这一系列的政策与思想，是体现了先秦的法家精神的。三国时期另一位推行法治的政治家是诸葛亮，陈寿称他“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行肃然”（《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可见诸葛亮亦具有法家治国的精神。

名家 与法家“赏必当功，罚必当罪”的“赏罚必信”和选拔官吏的“因任授官，循名责实”的原则密切相联系的思想则是名家学说。所以先秦的法家和韩非等人就很重视刑（形）名之学。以此随着曹操等人法治的推行，名家学说也得到了复兴。汉末魏初的名家主要是为推行当时的刑名法治服务的，讨论的问题集中在名实关系上，其代表人物有徐干等人。

徐干，字伟长，汉末魏初人。史书称：“干清玄体道，六行修备，聪明洽闻，操翰成章，轻官忽禄，不耽世荣。”（《三国志·魏书·王粲传》注引）他是一位很有学识而不图虚荣的人。当时正值汉灵帝之末世，“国典隳废，冠族子弟结党权门，交援求名，竞相尚爵号”（徐干《中论序》），出现了一股徒求虚名，不务实才的浮夸之风。这种风气是与曹操推行法治的务实精神不相融的，所以曹操提出了“明扬仄陋，唯才是举”的主张，要选拔那些确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而徐干思想的代表作《中论》一书就是为曹操的这一用人思想提供理论根据的。徐干在《中论》中，着重讨论了与选拔官吏有关的名实关系问题。徐干认为当时社会最大的祸患就在于求虚名，造伪名，以名相尚，“苟可以收名，而不必获实，则不去也；可以获实，而不必收名，则不居也”（《中论·考伪》）。一切以名为转移，甚而至于造成了“父盗子名，兄窃弟誉，骨肉

相诒，朋友相诈”的“大乱之道”（同上）。徐干还认为，为名的害处不仅会乱伦败俗，而且会丧家覆邦。他说：“夫为名者，使真伪相冒，是非易位，而民有所化，此邦家之大灾也。杀人者，一人之害也，安可相比也。”（同上）所以，追逐虚名是圣人绝对禁止的（“故求名也，圣人至禁也”）。为此徐干提出了自己的名学理论。他说：“名者，所以名实也。实立而名从之，非名立而实从之也。故长形立而名之曰长，短形立而名之曰短，非长短之名先立，而长短之形从之也。仲尼之所贵者，名实之名也，贵名乃所以贵实也。”（《中论·考伪》）这就是说，名是名其实的，先有实立然后有名随，犹如先有长形然后有长名一样。因此，实是第一性的，名是从属于实的第二性的东西。这是一个唯物主义的正确的名实学说，以此也就从理论上驳倒了只求名不务实的错误，在当时来说，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

由于名家的兴起，人们重视以名辩的方法考察名与实的关系，“作为推行正名与循名核实政治的张本”（唐长孺《魏晋南北朝论丛》第320页），从而出现了名理之学的研究，探讨名之理（即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文心雕龙·论说篇》说“傅嘏、王粲校练名理”，《三国志·魏书·钟会传》称钟会“以校练为家”，大概都是指的这一学问。当时所讨论的才性四本论，^①很可能就是与这种名理之学密切相关的。魏代另一位较著名的名家代表刘劭，他著有《人物志》一书，被《隋书》列入名家类著作，大概就是从名理学角度讨论了一个人

① 所谓才性四平者，“言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也”，“尚书傅嘏论‘同’，中书令李丰论‘异’，侍郎钟会论‘合’，屯骑校尉王广论‘离’。”（《世说新语·文学》注引《魏志》）

的材质问题的缘故。同时刘劭在《人物志》中，也讨论了名实关系问题。他说：“夫名非实，用之不效，故名犹口进，而实从事退。中情之人，名不副实，用之有效，故名由众退，而实从事章。”（《人物志·效难》）名与实是有矛盾的，名犹口进可以不副实，但实是不随众口而进退的，实只从事彰，在这里刘劭坚持了实是第一性的不随人的意志而转移的思想。晋代的名家代表人物，有隐士鲁胜。他曾著有《刑名》、《墨辩注》等，皆佚。今仅存《墨辩注序》一文，载《晋书》中。从这序文中看，鲁胜确是一位形名学家。其序云：“名者所以别同异，明是非，道义之门，政化之准绝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则事不成’。墨子著书作辩经，以立名本，惠施、公孙龙祖述其学，以正刑名显于世。”由此可见，鲁胜认为《墨辩》是研究名学的，并认为惠施、公孙龙的名家思想亦是祖述《墨经》的，并把《墨经》叫作《辩经》。以此可知，鲁胜虽为墨家人物，其实则是一位名学家，是魏晋时期名家代表之一。

汉末魏初的名家随名实问题的讨论，进入两晋时代，在玄学清谈的影响下，名理学家转入了对先秦惠施、公孙龙的名家微理的探讨。其代表人物有乐广、爰俞、阮裕等人。《三国志·魏书·邓艾传》注引荀綽《冀州记》说：“（爰）翰子俞，字世都，清贞贵素，辩于论议，采公孙龙之辞以谈微理。”所谈微理是何已尚不得而知。《世说新语·文学》则记载说：“谢安年少时请阮光禄（裕）道《白马论》。为论以示谢。于时谢不即解阮语，重相咨尽。阮乃退曰：‘非但能言人不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可得’。”可见当时懂得公孙龙“白马非马”思想的人已经太少了，要复兴先秦名家的思辩哲理实属困难。西晋乐广，官至尚书令，是当时名士中的一位领袖人物，他也重视对

先秦名家“微言”的研讨。据《世说新语·文学》记载乐广说：“客问乐令旨（指）不至者，乐亦不复剖析文句，直以麈尾柄确几曰：‘至不’？客曰：‘至’。乐因又举麈尾曰：‘若至者那得去？’于是客乃悟服。乐辞约而旨达，皆此类。”“指不至”本是《庄子·天下篇》载的先秦辩者之徒的一个名题，它与公孙龙的《指物论》思想有关。在这里乐广“不复剖析文句”所作的解释，并不一定符合原义，但其思辩方法倒是与公孙龙的名家思想有相一致的地方的。先秦名家讨论了运动与静止的关系问题，曾经提出了“飞鸟之景未尝动也”的命题。他们认为，飞鸟的影子是前影已消失，后影又继起，后影非前影，前影停留在前面，后影停留在后面，前后影子永远没有变动，所以说：“飞鸟之影未尝动”。在这里名家们看到了运动中有静止的思想，运动确实是事物在空间与时间上的间断性与不间断性、连续性与不连续性的统一，然而他们虽说涉及到了这一辩证法问题，但是他们又不承认这一矛盾，却把间断性加以夸大，否定了连续性的存在，从而得出了飞鸟之影不动的诡辩结论。乐广在这里似乎也是讨论的运动与静止的关系问题。他认为要说“至”，就是不能再离去。“麈尾柄确几”，这是说麈尾的柄落在几案上，这一行动一般人都称为是“至”，即麈尾柄确实落到了几案上。然而乐广却认为“至”就不能再去，现麈尾柄又可举起，说明前者的行动并没有“至”，所以乐广说“至”是“不至”的。我们说，“至”与“去”本来是一对矛盾，没有“至”也就无所谓“去”，没有“去”也就谈不上“至”，至与去是相对而言的。决没有绝对的“止”。乐广虽说看到了至与去这一对矛盾，然而他又不承认这对矛盾，就象先秦名家看到了运动与静止的矛盾，然而又不承认这对矛

盾，把静止加以了夸大，得出了“飞鸟之影未尝动”的结论一样，他也是割裂了“去”与“至”这对矛盾，认为能“去”就不可能有“至”，这样就把本是相对的东西加以绝对化了，得出了否定“至”的存在，“至”为“不至”的诡辩结论。由此可见，他们两者之间的思想方法确是有其相通之处的。

（二）玄学

玄学是魏晋时期的主流思潮，是魏晋时期的一种新道家。它以老庄学为主，同时又贯通儒道两家思想，用老庄学来解释儒学，并以先秦《老》、《庄》、《周易》所谓的“三玄”作为研究对象，所以当时一般都把它称作为“玄学”。玄学正式形成于魏正始年间，其创始人有夏侯玄、何晏、王弼等人。而魏晋时期的整个玄学的发展，大致可分为这样四个发展时期：第一时期为魏正始年间的何晏、王弼的老学，一般称作为“正始之音”或“正始玄学”，属于玄学的贵无学派。第二时期为魏末的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老庄学，他们以反名教而著称，他们的思想可称作为“竹林玄学”，或“林下之风”。第三时期为西晋玄学。西晋时期玄学有两支大的派别：一是元康玄学放达派，一是郭象的庄子学派。郭象庄学是以玄学贵无派的反对派面貌出现的，是属于玄学崇有学派。第四期为东晋玄学。东晋玄学亦有两个重要方面：一是张湛的《列子》学的玄学，一是佛教与玄学结合的佛教玄学。佛教玄学应属于佛教范围的内容，所以在这里就从略了。下面我们就分别来介绍这四个时期以及玄学不同派别的情况：

1. 正始年间何晏、王弼的贵无派玄学

何晏、王弼是魏晋玄学的首领人物。统治魏晋时期整个一代哲学论坛的玄学思潮，就是由何、王开倡起来的。何、王玄学的产生，正处于魏正始年间，当时曹魏政权已经衰弱，地主阶级两大政治集团，即曹魏集团与司马氏集团之间的斗争正进入白热化时期。曹魏政权则处于摇摇欲坠之中，而当时的朝政由曹爽与何晏等人控制，他们独揽大权，竭力想排挤实力雄厚的司马氏势力。王弼则依附于何晏，在曹魏政权中充当角色。面对着这样的一个政治局面，何晏、王弼为了维护曹魏政权的统治，他们又自感自己力量的不足，因此极力想为曹魏政权提供一套统治的办法（“统治术”）来稳住曹魏的统治。而先秦的《老子》却正是研究了一套“君人南面之术”的思想，它要用少费气力的办法实行无为而治来达到统治天下的目的。这就是所谓“以弱胜强”、“以柔克刚”、“以一统众”的办法。这种思想则正是符合力量已经衰弱的曹魏集团的愿望的。为此，何晏、王弼极力推崇老子，鼓吹老子的无为之术，其目的无非是企图用老子的无为政治来维护曹魏的君臣名分等级秩序（即所谓“名教之治”）而已。所以，王弼他们要求统治者能清静无为于上，〔“以无为为君，以不言为教”（《老子》二十三章注）〕，老百姓能相安无事于下〔“物无所尚，志无所营，各任其贞”（《周易·损卦》注）〕，认为只要做到这样“各定其分，短者不为不足，长者不为有余”（《周易·损卦》注），各守自己的本分，在上的统治者就可坐享太平了。为了给这一理论提供一个哲学的根据，何晏、王弼还提出了一个“以无为本”、“以有为末”、“以无统有”、“以静制动”的哲学本体论论证，认为宇宙的本体是“无”是“静”的，世界上存在的各种具体的存在物属“有”的范畴，“有”是动